科学把握推进制度型开放的战略意义和实践要求

刘江宁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至五卷通读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开放发展，围绕新时代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深刻阐释。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至五卷中，从“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到“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从“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到“推动形成开放、多元、稳定的世界经济秩序”，一系列重要论述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新时代对外开放规律性认识的不断深化，丰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下，“十四五”时期我国开放发展取得积极成效。今年以来，面对外部环境复杂变化，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已成为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高能级开放平台加速打造；前三季度，我国进出口都保持较快增长，贸易平衡发展取得积极成效，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7.1%，对东盟、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快速增长；过境免签政策适用范围不断扩大，“中国行”持续圈粉全球游客。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经贸规则深刻调整，制度型开放成为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着力点。习近平总书记在近年来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多次对制度型开放作出深刻论述，在2023年峰会上指出“中国正在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主动对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高标准经贸规则”，在2024年峰会上强调“中国将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继续和世界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在2025年峰会上宣告“中国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促进各类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竞相发展”。“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求“开展更大力度制度型开放试验”。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至五卷中关于制度型开放的重要论述，科学把握新时代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的实践要求，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

推进制度型开放具有重要战略价值

制度型开放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题中应有之义。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提出：“要适应新形势、把握新特点，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五卷的《紧紧围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这个中心任务奋发进取》一文中指出：“我们要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优化区域开放布局，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概括来看，制度型开放以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为核心，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实现国内制度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衔接。具体来看，制度型开放是更加深入的开放，从“边境上”措施向“边境后”措施延伸，不断完善法律法规、体制机制、监管模式、标准体系等，在产权保护、环境标准等领域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是更加系统的开放，通过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等，破除妨碍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更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更加主动的开放，注重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等新领域主动参与、引领全球新规则的制定，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完善，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当前，国内外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具有重要战略价值。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新时代以来，高质量发展成为主旋律、取得明显成效，但仍面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比如，市场体系仍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等。这些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反映，是发展中的问题，必须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从体制机制上推动解决。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既能够推动国内重点领域深化改革，完善有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又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运行质量，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加持久的内生动力。

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途径。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这一过程离不开持续深化人才、技术、资本、数据等要素流动型开放，也需要以制度型开放推动规则对接、标准互认、机制互通。推进制度型开放，能够有效促进国内外市场相通、产业相融、创新相促、规则相联，在更高水平上形成良性循环。具体来看，通过对接国际通行规则，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有利于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同时形成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通过塑造更高水平的制度环境，有利于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提升国内国际双循环质量和水平，实现国内经济与全球经济的良性互动。

增强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的战略路径。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正经历深刻变革，伴随数字经济、绿色低碳发展、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新议题涌现，全球贸易竞争越来越体现为标准、规则、合规能力等方面的竞争。主动适应全球经贸规则重构走向、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是我国由国际规则接受者向建设者和引领者转变，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的迫切需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既能够增强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坚实支撑；又能够增强我国制度性话语权，营造良好的国际规则环境和制度环境，稳定和扩大对外经贸合作。

新时代以来我国制度型开放全面提升

新时代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始终是外商投资兴业的“热土”，对外投资大国地位日益巩固，制度型开放迈出新步伐。

市场准入有序扩大。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是我国制度型开放的直观体现。近年来，我国进一步深化外商投资促进体制机制改革，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不断缩减，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制度保障。目前，全国版和自贸试验区版两个负面清单已大幅“瘦身”，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实现“清零”；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还延伸到了跨境服务贸易、数据跨境流动等领域。今年以来，《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等政策接续落地，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等方面提出相关举措。这充分彰显出我国开放维度的跃升、营商环境的优化，成为外资长期深耕中国的信心之源。今年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在华商会近期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多数外资企业在中国都实现了较好盈利，增资布局的意愿普遍提升。

开放平台先行先试。高水平开放平台是我国制度创新的高地。新时代以来，我国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目前，23个自贸试验区“雁阵齐飞”，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形成覆盖东西南北中、统筹沿海内陆沿边的开放格局，在探索开放新路径、积累改革新经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了许多标志性、引领性制度创新成果。在此基础上，我们不断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提质增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的意见》，国务院发文复制推广上海自贸试验区77条试点措施。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我国不断以高水平开放平台建设推动深层次改革、高质量发展，在更大范围释放制度创新红利。

服务业和数字领域开放提速。服务业和数字领域是推动开放型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重要领域。近年来，我国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与服务贸易密切相关的人员、资金、数据等要素便利、安全地跨境流动。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2025年首次突破8万亿元，今年1—7月同比增长8.3%，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与此同时，我国有序扩大数字领域开放，完善数据基础制度和监管模式，在守住数据安全底线前提下，提升数字贸易标准化水平，积极对接国际通行标准，持续优化数字贸易发展环境。2025年我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总额达4323.1亿美元，同比增长6.3%。当前，我国围绕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试点一批有利于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制度创新举措，稳步推进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等领域的制度型开放。

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不断完善。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共建“一带一路”是源自中国、属于世界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当前，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基础设施“硬联通”持续深化，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加快建设，建成中老铁路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规则标准“软联通”日益健全，我国已同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为全球共同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共建国家人民“心联通”日趋紧密，一个个路、桥、港、园区、装备项目，更精准对接各国发展刚需、贴合民众民生期盼，让合作红利惠及万家。在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上升背景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注入团结、合作、共赢的正能量。

进一步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加快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

在第五卷的《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高质量发展》一文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加快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新时代以来我国制度型开放取得历史性成就，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

同时也应看到，我国制度型开放仍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多边机制遭受冲击，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高标准自贸协定涉及的“边境后”领域还在不断拓展，国内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依然艰巨。解决问题、应对挑战，要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进一步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具体可在以下方面着力。

一是在规则对接上深化探索。深入研究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发展趋势，结合我国产业基础和制度条件，明确对接重点与实施步骤，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协商。二是加强对开放试点的经验和成果推广。及时将实践中的好经验好做法转化为制度规范，推动局部试点向系统集成拓展，同时将制度创新红利与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相结合，增强制度创新的整体效能，打造“投资中国”品牌，塑造开放新优势。三是强化开放与改革协同。围绕公平竞争、产权保护、标准衔接和监管协同等重点环节，全面清理市场壁垒，破除妨碍公平竞争的制度障碍，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促进制度规则有效衔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四是注重保障开放安全。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贸易摩擦应对机制，健全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等制度，强化金融、产业链和数据安全保障，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稳步扩大开放，以制度型开放推动深层次改革和高质量发展。

（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构建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着力点

高培勇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及经济规律的学科，构建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是我国经济学界肩负的光荣使命。构建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是要整体构建还是进行局部修补？这是首先要解决的认识问题。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同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一个侧重知识体系构建，一个侧重学科建设发展，在主体内容上基本相同，都涵盖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在方法上高度一致，都要以党的创新理论引领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经济学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学科，经济学知识体系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决定了构建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同构建中国经济学在主体内容上也基本相同，都是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导下，对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系统构建。

从我国经济学发展历程看，构建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是我国经济学“本土化”的高级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引进、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但这一过程绝非简单照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自身国情，坚持洋为中用、为我所用，努力实现经济学或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本土化”，始终是我国经济学界不懈的追求。围绕经济学或经济学理论体系“本土化”的探索一直在深化，涌现了一大批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标志性成果。

相对于“本土化”，“中国自主”则是站在新的更高起点上的阶梯式递进目标，即以自主为导向“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意味着我国经济学要在学科自主性、学术自主性、话语自主性等方面实现根本性提升。这自然不能是一个局部的、零敲碎打的过程，而是要坚持系统观念，站在经济学“本土化”的肩膀之上，锚定中国经济学的学科自主性、学术自主性、话语自主性，更加整体性地完成构建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任务。我们不仅要从根本上摆脱对外部的“学徒心态”“依附心理”，不断发现“自主逻辑”、形成“自我主张”，在学术根底和文化传承上自信自立；而且要从中国自身的经济现实及其文明根基出发，在深入研究中国经济运行规律的基础上，构建中国人自己的经济概念体系、经济言说方式，围绕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更好地传承发展中华文明、更有力地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由“本土化”跃升至“中国自主”，既是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目标定位，更凸显了我国经济学发展的核心和灵魂。

基于对整体构建的认识，构建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需要把握以下着力点。

其一，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是一门关于中国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其主要研究对象在于中国经济运行的规律性。因此要跳出现象看本质，紧盯中国经济学运行规律，围着中国经济运行规律转，奔着中国经济运行规律去，最终体现于对中国经济运行规律的揭示和提炼。将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作为一个经济科学体系加以构建，这是构建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必须体现的深层底色。

其二，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要遵从经济学一般学术规范。以阐释中国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为基本内容，以专业化、学理化、体系化的方式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进行创新，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中国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是构建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必由之路。

其三，构建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要同构建中国经济学联系起来，当作同一个任务、同一项工作加以推进。不宜也不能另辟蹊径、试图将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打造成不同于中国经济学或与中国经济学并行的另外一种体系。这是把准构建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突破口的关键。

其四，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中国特色，集中体现于中国自主。坚持以“中国自主”而非停留于“本土化”为学术导向，把中国自主落实于构建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全过程各环节，既是根本方向，更是着力重心。只有牢牢抓住“中国自主”，才能真正构建起以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为主干的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为世界经济学发展作出中国的理论贡献；才能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

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发挥体育自塑作用 夯实全民健康根基

王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体育是重要的社会事业，关乎人民幸福与民族未来，具有前置预防、主动康养、身心同健等作用，是直接且可持续的“健康自塑”方式之一。“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并将其纳入“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专章，体育在全民健康中的前置性、基础性功能被摆到更为突出的位置。落实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建成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要把体育推向健康治理的源头环节，以体育参与推动预防关口前移，夯实全民健康根基。

发展体育事业，通过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体卫融合机制、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计划等载体，以全面社会动员前移健康关口，搭建起全民参与、常态坚持、内生自觉的健康促进体系，有助于持续改善国民身体素质、提升社会整体健康意识，为全生命周期、全人群、全方位、多层次的健康治理与保障提供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体育事业蓬勃发展，全民健身取得惠民新成效，体育对人民健康的促进作用不断显现。但从体育与卫生健康深度融合上看，体卫融合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主动健康”治理模式在实践中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基层科学健身指导力量薄弱，运动处方人才培养和使用不足，群众“想练不会练、练了不科学”的问题仍然存在；服务供给与群众精准化、差异化健康需求之间匹配度不高，“主动健康”还多停留在测评、阶段性活动层面；多主体参与的治理格局需进一步完善，存在跨部门协同机制不够顺畅、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发育不足、社会力量参与体育治理的渠道和平台有限等问题。要进一步凝聚全社会力量推进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以精准供给提升体育赋能全民健康实效。

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力发展群众体育，通过全民健身实现全民健康”。全民健身旨在通过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提高国民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当前，我国全民健身发展呈现出参与规模持续扩大、运动项目人口基础不断夯实、“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等良好态势，但人民的健身和健康需求与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之间仍然存在矛盾。要找准影响人民群众运动参与和健康收益的关键因素，破解因场地、时间、技能、认知意识等因素影响体育参与和健康促进的突出矛盾与关键问题，增强全民参与体育的公平性、可及性和普惠性。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推动优质体育资源向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全民健身组织网络，持续培育全民健身新场景。构建城乡一体、覆盖全民的服务体系，建立健全科学健身指导体系。同时，要关注老年人、残障人士等群体的健身需求，提供适老化、无障碍健身服务，让体育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加快推动体卫融合发展。体卫融合打破体育领域与医疗卫生领域的壁垒，以“运动是良医”的理念，把科学健身融入疾病预防、慢病管理和康复干预等过程，推动健康重心从治病前移到防病。要通过机制衔接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加快推动健康理念、服务供给、运行机制从“被动治病”向“主动健身、主动防病、主动养生”全面转型。建立体育部门与卫生健康部门协同联动机制，推动医疗机构设立运动健康指导门诊，培养运动处方师等复合型人才。针对慢性病患者、亚健康人群等制定个性化运动干预方案，发挥体育在疾病预防、康复治疗中的重要作用。建设一批体卫融合示范基地，整合体育场馆、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资源，为群众提供集健康监测、运动指导、慢病管理于一体的全方位健康服务，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需求。

壮大体育产业。体育产业是绿色产业、朝阳产业，也是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不断创新业态，推动体育产业与养老、文旅、康养等领域跨界融合，培育健身休闲、运动康复、户外体育、智能健身等新兴业态，构建全链条、多元化的体育产业体系。聚焦群众差异化、品质化健康需求，丰富体育产品与服务供给，从传统健身场馆服务向个性化健身定制、科学健康管理等延伸，实现产业发展与群众健康需求精准对接。打造智慧健身场景、线上健康指导平台，推动传统体育服务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提升服务效率与体验感。持续释放体育消费潜力，布局城乡体育消费新场景，打造特色体育消费街区、户外运动基地、康养体育综合体等场所。引导群众树立常态化体育消费意识，推动体育健身从可选消费转变为日常消费，让体育产业成为推动全民健康、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支撑。

构建协同治理格局。当前，我国多主体参与体育协同治理的框架已初步建立，但治理效能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仍存在差距。跨部门统筹联动机制有待进一步通畅；基层体育社会组织专业化服务能力偏弱，承接公共服务、动员基层群众、延伸服务末梢的作用发挥不足；社会力量参与渠道有限、常态化平台不足，参与深度、广度有待拓展。增强治理合力，有助于推动基层体育健康服务形成稳定的组织依托与资源保障，以常态化、可持续的长效机制赋能全民健康。要坚持系统观念、强化共建共治，健全体育领域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培育壮大基层体育社会组织，拓宽社会力量参与路径，推动政府部门、社会组织、经营主体、基层自治组织同向发力，凝聚全社会协同推进的强大合力，切实把治理优势转化为基层服务实效，为全民健康筑牢坚实的体育治理根基。

营造健康自塑、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厚植健康文化土壤，在全社会塑造热爱、追求健康的文明风尚，是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向社会自觉、全民行动转化的重要一环。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体育文化与健康智慧，不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促进传统体育与现代健身理念相结合，开发适合当代的传统体育健身课程和产品，让古老健康智慧焕发新生机。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通过举办体育赛事、开展主题教育活动等形式，普及科学健身知识和健康生活理念，增强人民群众主动健康意识，引导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健康观，把对体育的热爱转化为追求健康的实际行动。鼓励创作体育文化作品，讲好中国体育健康故事，增强体育文化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在全社会营造参与体育、追求健康的良好氛围，让主动健康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ZHUAN TI SHEN SI 专题深思